

自由谈

陈文胜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完善农业补贴政策，“新增补贴向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产区倾斜。在有条件的地方开展按实际粮食播种面积或产量对生产者补贴试点，提高补贴精准性、指向性”。这实际上就是要求进一步强化农业的支持保护制度，力争在体制机制创新上取得突破，以有效发挥财政资金对农业生产导向作用，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优化农业补贴机制，是提高惠农政策效应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现有按土地面积补贴的农业补贴方式，曾经极大地激发了农业生产积极性，但随着农村土地流转的加速，土地承包权与土地经营权分离，对农业补贴带来了新的挑战。由于农业补贴方式粗放，农业补贴基本上为土地承

包人所有，粮食生产者无法得到补贴。这种与粮食生产不完全挂钩的农业补贴方式，不仅不利于调动种粮农民的积极性，减弱了当前粮食补贴的政策效应，更强化了农业经营制度的约束，加重了土地流转的成本，阻碍了农业生产走向规模化和集约化，导致农业组织化、集约化程度提升缓慢，农业市场竞争能力低下，延缓了传统农业的现代转型。因此，对新增农业补贴进行改革，是顺应农业发展转型的创新之举。

优化农业补贴机制，是提高农业补贴精准性必须破解的现实难题。目前农业补贴的发放，是一种典型的“撒胡椒面”的平均主义方式，已经越来越偏离政策预期，对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影响不大，无法解决农业发展的现实问题。将农业补贴与粮食生产挂钩，实现农业补贴的精准性、指向性，不仅体现了国家财政政策的公平、正义，而且适应

了当前农村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实需要，为农业现代转型提供了政策与体制机制保障。

与此同时，对于粮食主产区而言，一方面肩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责任，而另一方面，农业补贴对农民“人人有份”，对主产区奖励补贴不与产量挂钩，成为一种“普惠”政策。虽然农业大县肩负着粮食安全的国家责任，但由于农业生产效益偏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农民对农业增收的期望较低，不少主产区的耕地抛荒现象十分严重。而区分产品、区分经营主体、区分产销区域的补贴，就打破了农业补贴在行政区域上的平均主义，使粮食主产区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发展现代农业过程中更有政策保障，更有信心，有望跳出“背着包袱抓粮食，抓了粮食背包袱”的怪圈。

优化农业补贴机制，必须使政策的推动力对接市场的原动力。优化农业补贴机

让农民乐意种粮

制这一创新在实践中具体操作，必然会遇到一些困难：一是核实播种面积难。全国农业播种面积庞大，而且地形复杂，各地情况不同，要按照实际播种面积进行补贴，困难大、问题多、成本高，难以实际操作。二是核实粮食产量难。要对千家万户的粮食产量进行核定，其中的难度是难以想象的。如果在收购环节进行补贴，历史上就发生了不少国有粮仓、粮食企业套取国家补贴资金的典型案例。

如何优化农业补贴机制，以保证农民能够从种粮中得到比较收益？一方面，政策补贴的推动力要通过市场价格的原动力起作用，另一方面，市场的价格原动力需要政策补贴的推动力来激发。市场激励需要政策配套才能走得更远，而政策补贴必须得到市场的激励才能持续推进。

近年来，由于农产品价格远低于农资价格和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幅度，农业补贴再高，也无法超越其在市场中获得的实

质效益。因此，仅仅依靠政府的财政补贴毕竟有限，关键是要发挥市场机制激活农民从事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对农民而言，没有比价格信号更直接激活其从事生产的原动力了。

当前，最关键的问题是，粮食最低保护价按照什么样的原则确定，才能发挥价格信号对资源配置的诱导作用？粮食最低保护价的确定，应该取决于社会劳动力的平均价格、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及其上涨的幅度、技术和资金投入所取得的社会平均利润及其通货膨胀的幅度等市场因素。目前的粮食最低保护价，根本未能反映市场价格因素的动态变化。例如，现在我国进入了劳动力价格上升的阶段，农村工价持续上涨对粮食价格的影响长期以来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粮食价格无疑会紧跟劳动力价格、农资价格等整个物价的上涨而相应上涨。

(作者为湖南省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

资金不流动
M2再多又有何用

覃浩俊

央行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110.65万亿元，同比增长13.6%。这一数据虽然低于市场预期，但仍略高于去年初制定的13%的目标值，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

早在M2突破百万亿元、并一举超过美国时，有关货币超发的话题，就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热议。M2快速膨胀，到底是不是货币超发造成的，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货币有没有真正“动”起来，并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如果形成了现实生产力，自然，M2多一点并没有太大问题。

显然，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货币并没有真正“动”起来，至少，“动”的力度不够强、强度不够高。因为，同样的货币供应量，美国产生的GDP是我国的两倍。

虽然相关专家表示，由于统计口径不同，我国的M2破百万亿元，不能与美国相提并论。因此，对GDP的影响也不能简单比较。而且，在我国的货币体系中，还有巨额外汇储备这一特殊因素。即便如此，只产生相当于M2一半数量的GDP，还是无法合理解释。

事实上，从近年来货币供应的实际情况来看，如此规模和速度的货币供应，既没有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也没有形成对应的GDP，确实是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就算M2中存在居民储蓄存款比例偏高，以及巨额外汇储备的因素，也不足以解释这种奇怪现象。唯一的可能，就是资金的流动性太差，没有与财富形成产生互动，而是在银行间盘来盘去。

首先，大量的货币都变成了钢筋混凝土，使资金出现了严重积淀。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每年新增的银行贷款就都在10万亿元左右，仅此一项，就有几十万亿元。如果再加上直接融资，其规模是相当可观的。但是，这些资金都投放到哪里呢？可能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房地产，二是政府融资平台，三是“铁公基”等各种基础设施。也就是说，多数都变成了钢筋混凝土，而真正能够实现资金乘数效应的实体经济，却很难得到资金的支持。自然，资金的流动性就差，使用效率也很难提高了。

第二，居民消费欲望不强和投资渠道不畅。居民储蓄存款居高不下，并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也不是居民生活水平高的标志。恰恰相反，它说明居民消费动力不强和缺乏应有的投资渠道。譬如股市，过去每年拉动消费在2000亿元以上，现在，不仅不能拉动消费，反而挤压了消费。再如住房，由于价格持续上涨，让居民的消费能力大大下降，消费预期越来越弱。最终结果，就形成居民拼命储蓄、政府拼命投资、资金拼命在钢筋混凝土中积淀的恶性循环。相反，如果居民有强烈的消费欲望，且具有良好的投资通道，那么，居民储蓄就有可能变成强大的消费动力和财富创造力。

第三，企业缺乏投资动力。按理，社会投资的主角应当是企业，而不是政府。但是，从近年来的情况看，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取代了企业在进行投资，而企业却因为市场和环境等方面的原因，投资动力严重不足。如此一来，资金的流动性就只会越来越差，产生的效率也会越来越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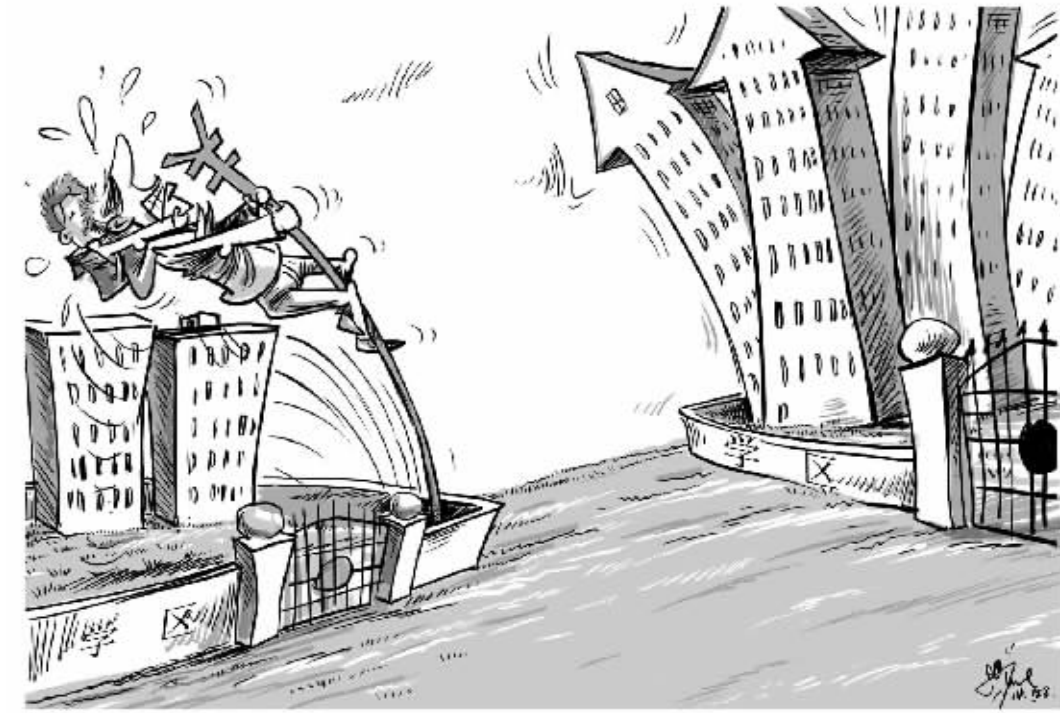
第四，银行的不规范行为过多。其他方面不谈，单就贷款来看，企业要想获得贷款，就必须按照贷款金额在银行存上一笔保证金。也就是说，从表面看，企业拿到了贷款，实质，相当一部分又变成了存款，且企业不能随便调用。如此一来，这些钱对企业来说，就变成了不能产生效益的死钱，货币的流动性也就相对减弱。

正是因为存在这些方面的问题和缺陷，所以M2的膨胀并没有带来社会财富的同步增长，反而留下了通货膨胀的巨大隐患。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避免风险的发生，值得管理层重视与关注。

舒圣祥

从国土资源部获悉，一些媒体所谓“不动产登记局挂牌”，“将建信息公开查询系统”的报道不实。国土部表示，建立和实施以土地为核心的不动产登记制度，是我国产权管理体制机制的重大改革，涉及统一登记机构、统一登记依据、统一登记簿证、统一登记信息平台等工作，要逐一落实到位，任务极其艰巨。（新华网1月28日）

大多时候的政府辟谣，公众其实是可以预料到的，那些新闻“长”得就是一副要被辟谣的样子。相比之下，不动产登记



择房

《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小升初”免试就近入学，试图给多地愈演愈烈的“小升初”择校热、考试战泼一盆冷水。不过，不少人担心学区房又要涨价了！（《青年时报》1月28日）

漫画：徐简

贫困县“摘帽”需要正向激励

王钟的

据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国良1月27日表示，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重点县只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临近，重点县将逐步退出和减少，今后要研究建立重点县退出机制。王国良说：“对于重点县退出的问题首先是那些县的群众不愿意退。另外，干部也不愿意退，也不敢退。”

扶贫办副主任提到的“重点县”，即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尽管贫困县的身份在外界看来意味着一个地方经济落后，但是对许多贫困县主政者来说，国家评定后的贫困县，会为当地带来不少扶贫资金。南充市扶贫移民局局长近日就在四川媒体上感慨：“贫困县的含金量很高，有了这个帽子，金融、交通、水利、教育等各个领域的重点项目都会随之而来，帮扶力度很大。”在此背景下，争抢贫困

县名头的现象也就见怪不怪了。一些地方为保持贫困县身份，甚至不惜在统计数据上造假，而争取来的扶贫资金却多用于“大项目”开销，以便在GDP考核中取得成绩。

中央为贫困地区提供项目资金，本意是为了培养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而非倾国之之力为它们“输血”。贫困县在享受国家的政策优惠和资金扶持时，自然应该明确自身的责任意识，摒弃“哭穷的孩子有奶吃”的思维。然而，一些贫困县把这个身份当成了个既得利益，没能利用扶贫资金改善民生，缩小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为此，国家在贫困县考核中，更有必要强调项目资金利用的产出效率，严格控制对脱贫效果不明显地区的项目审批。以往越穷越给钱的做法，并不符合经济规律，也不能实现脱贫工作的正向回馈。

建立贫困县退出机制，要让之前戴着贫困县帽子的地区看到“摘帽”的好

处。一个地方脱贫工作做得好，经济发展能力上去了，不妨对政府工作人员予以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奖励，如适当提高摘帽后公务员工资，对主要领导干部优先考虑提拔等。对脱贫工作一无所成的官员要有相应惩罚措施，不能让贫困县的主政官员感觉到自己到贫困县任职是一个过渡乃至一种政治资本。如果在脱贫条件明明允许的情况下，贫困县的主政官员还是不惜代价保卫贫困的帽子，那么其执政能力就值得考量了。

另外，衡量一县是否脱贫应当更多地从民生指标考虑，让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才是脱贫的真正意义。如果贫困县退出机制启动，仍然以GDP等宏观数据为先决条件，难免出现地方政府为了政绩仓促脱贫的现象。一个县没有脱贫，应该看这个县最贫困的一部分人生活水平有没有明显的提高，把低收入者、农业人口的平均收入列入脱贫标准，才是衡量该地区实际不贫困的方法。

回望春晚，陈佩斯为什么被怀念

邓海德

在过去30多年参加春晚的演员中，谁留给大家的印象最深刻？民调显示，受访者提及最多的是陈佩斯、朱时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民俗学者萧放认为，当今社会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但矛盾可以通过诙谐的方式表达出来，就像上世纪80年代相声很红火，当时就有很多针砭时弊的段子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中国青年报》1月28日）

冯氏春晚就要来了，这是新民俗，也是全民吐槽大会。春晚怎么办，实在众口难调。虽说治大国如烹小鲜，但烹制一台交口碑的春晚，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在春晚成为“国家项目”的语境下，宏大叙事与市井声音，价值传达与温情展示，总有点剪不断、理还乱的意思。我们自然不用操心春晚走向哪儿，在具象的节目之外，它更像是陪伴，在单薄

的家庭结构中营造了一种闹腾的过年氛围，陪伴着青春成长或年华老去。

春晚这些年，沉淀与淘洗的，是时代感十足的广大大众文化取向。回头看，春晚给大家印象深刻的演员，受访者提及最多的是“陈佩斯、朱时茂”（25.3%），“赵本山、宋丹丹、范伟”（23.6%）紧随其后。接下来是：“冯巩、牛群”（12.0%），“潘长江、黄小娟”（5.4%），“赵丽蓉、巩汉林”（4.0%），“郭达、蔡明”（3.9%），“周杰伦、陈奕迅、王菲”（3.6%）等。这当然不是说歌舞杂技日薄西山，而是在主流意识与政治期待之外，公众对春晚的角色定位初心不改：娱乐，关照现实的、遵从人性的娱乐，才是观众最爱。

1983年第一届春晚王景愚表演的哑剧《吃鸡》，以及1984年春晚陈佩斯、朱时茂表演的《吃面条》，成为历久弥新的经典，但如果说它们的共性，那就是没有任何宏

大意义，只遵循幽默规律，用夸张的肢体动作，让人开怀大笑。舞禁初开的年代，那种开怀大笑的痛快，是单纯而甘冽的。艺术家说，百无禁忌是幽默的本真。当春晚还未成为年货之时，它没有价值的负担，也没有为盛名所累，一人唱几首歌都可以，开心欢乐最重要。而一朝成为图腾，就注定不可能绕开形式的窠臼，在无意义中建构自己的意义，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道具，都可能被寄寓无尽的想象，又怎敢轻易讽刺揶揄？春晚语言作品越来越不痛不痒，说到底是因为在春晚这个舞台上，艺术表现不知不觉患上了“高大上”之病。

公众对陈佩斯的怀念，未必是当开怀念不忘某个人，而是对春晚舞台当年一笑、单纯回归的期盼。本该最活泼、最生动的民俗大舞台，却硬生生在各种规则中戴着镣铐跳舞，步子越迈越小，衣服越穿越厚，声光迷离的舞台、鬼斧神工的技术，又如何真能博人一笑？

不妨公开说说不动产登记“烦恼”

局挂牌的新闻被辟谣，就有点出乎预料。因为，建立和实施以土地为核心的不动产登记制度，已经明确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会议过后，很多改革项目都已启动，也该是不动产登记制度有实质性动作的时候了。可是，国土部的辟谣告诉我们：公众想得简单了。

所谓“任务极其艰巨”，可以理解为：《决定》已经作出明确部署，但要落实到位恐怕还得经过“九九八十一难”，还得应对各种博弈。在公众看来，不动产登记不过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为什么落实起来却“极其艰巨”，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利益

关系？对此，公众只能猜测。

可以揣测的是，不动产登记将要挑战“房多多”们的既得利益。之前，全国住房信息联网工作，承诺了N次时间表又失信了N次；最后，40个主要城市住房信息联网工作已经完成，却要“秘不外交”。住房信息联网也好，不动产登记也好，虽然直接目的不是为了反腐败，但在官员“房多多”泛滥成灾的背景下，事实上能够起到反腐作用。

另一个可以揣测的角度是，不动产登记将要挑战相关部门的既得利益。之前的不动产登记有N个婆婆，现在要统一

到一个婆婆，有的部门扩权了，有的部门当然就要削权。此事究竟谁来负责，责权利如何划分，估计达成共识不容易。如若不然，为何“协调有关部门，建立部际联席会议制度”，都这般困难呢？

当然，这些只是公众的揣测，我不愿相信不动产登记，或者被腐败利益绑架，或者被部门利益绑架。问题是，除了不为人知的幕后博弈，相关部门不能将不动产登记一登记之难难在何处，直接摆到桌面上来谈？这样才能赢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并有望借舆论之力促进不动产登记更快实行。

百姓说话

有必要奖励李娜80万元吗

张田勤

1月27日中午，湖北省委、省政府有关领导，在武汉会见了刚刚返回家乡的澳网女单冠军李娜及其丈夫姜山，并奖励李娜80万元人民币。

这一举措，引发了网民的热议。截至1月28日13时，新浪网的一项网络调查显示，参与投票的人中，76.4%的人选择了反对奖励李娜。

奖励李娜的钱既不是省委的，也不是省政府的，而是纳税人的。按理讲，湖北出了这么一位名人，是家乡的骄傲，也值得家乡父老乡亲给予奖励。可是，奖不奖励李娜和奖励多少，应当由湖北的纳税人来决定。就目前的权限和程序来看，只有湖北人大能代表湖北人民作出是否奖励李娜，以及奖励多少的决定。那么，这一奖励是否通过了湖北人大的决议，是通过什么程序批准的？如果这些问题不透明，或根本就没有经过正常合法的程序，就不会得到纳税人的认同。

李娜并不缺钱，但她的个人财富，是自己的辛勤劳动所得，比如获得冠军的奖金和代言广告的收入。而湖北省的此番奖励，未必是李娜所需要的。从奖励现场的照片看，李娜一改澳网获奖时的神采飞扬和妙语连珠，一脸肃穆和淡淡地接过奖金，看不出任何喜悦之情，说明她未必认同这种奖励。

当然，李娜对于奖金是怎么想的，外人并不清楚。有人说，李娜并不缺这80万元人民币，但她也并非视金钱如粪土。因为，她获得澳网冠军感言的第一句话便是：“首先感谢我的经纪人，他让我更富有了。”所以，李娜并非不爱财。只是，君子爱财，要取之有道。对取之无道的钱，李娜是否会接受，还得打个问号。

按以往的做法，这次奖励李娜的钱，她可能还会像过去一样，捐出去。2011年李娜获得法网冠军后，湖北省政府授予她“湖北跨越先锋”荣誉证书，并奖励60万元奖金。李娜在纳税之后，自己掏腰包，凑够50万元捐给了武汉市孤残养老院。

从李娜对待奖励的冷漠中，地方政府和官员应该反思，在奖励明星名人之时，是否应考虑程序的合理合法？不要擅自替纳税人作主，更不要一厢情愿地认为获奖者会欣喜接受。

为什么需要
第三方教育评价与考试

张勇

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评价与考试主要来自教育行政部门内部，它们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教育评价与考试的“主体单一”、“模式单一”、“指标单一”、“理论陈旧、技术落后”等问题严重，导致非人本、不科学、难公正、欠合理等诸多积弊，严重阻碍了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以致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教授说“考试不改，教育难兴”。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考试与评价制度改革，明确提出了“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基本模式；健全考试与招生相对分离、学校考试可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构建衔接沟通各级各类教育、认可多种学习成果的人才成长‘立交桥’”。我对此的简单理解是：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要走第三方教育评价与考试模式。

第三方面教育评价与考试，是舶来品，它肇始于西方。从大约公元前400年至19世纪末叶，这在教育评价史上被称作“考试时期”。教育评价（当时称考试）的方式主要有“问答”（口试）和“论文”（笔试）。当时教育测量还未产生，对口试和论文，是依靠施教者或管教者通过观察和阅读，进行人工评分，带有很大的主观性、随意性、随机性，也缺乏客观性和公正性。基于客观公正理念的“第三方评价”于15世纪的欧洲在社会、经济领域产生并很快延伸到其他领域。

教育评价不但决定着教育发展，更关乎受教育者的命运和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其能否有效和客观公正，至关重要。18世纪到19世纪的科学革命浪潮，使教育奠定了科学化思想；实验心理学和教育统计学的发展，为解决教育评价的主观性、随意性、随机性问题提供了理论和方法。教育评价开始了客观化、数量化和标准化之旅，走上了科学、有效、可靠、可信的征途。

20世纪初至30年代，教育评价进入“测量时期”，测量技术的科学性和专业化要求，导致学校和教管部门无力承担测量评价功能，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始从教育测量的角度开始登场。

20世纪30~50年代，教育评价进入“目标中心时期”，美国的泰勒（Tyler, R）提出了以教育目标为核心的教育评价原理和“教育评价”概念，把教育评价与教育测量区分开来，并形成了教育

评价的“泰勒模式”。随着泰勒模式推广，大学入学的标准化测试开始，“第三方评价”思想和方法也得到系统的导入。这个时期，如SAT等大型第三方考试与评价纷纷成长起来。

20世纪50~70年代，教育评价进入“标准研制时期”，目标参考测验也发展起来，并使“泰勒模式”成为主流模式。斯塔夫米勒(D.L. Stufflebeam)提出“CIPP模式”，斯克里克文提出“目标游离模式”，推动了评价标准的发展。这个时期，教育测量标准、评价标准，以及教育评价的标准化问题都得到了空前的解决，使第三方教育评价成为主流模式。

20世纪70年代后，进入“建构时期”，关注评价过程，强调评价过程中评价给予个体更多被认可的可能，重视评价对个体发展的建构作用，评价的以人人为本时代由此开始。80年代开始，项目反应理论把教育评价引入了计算机化和因人施测的方向，模糊评价法发展了教育评价的数据处理技术。美国加德纳教授的多元智能理论，革新了智力测量观，使得传统教育评价受到巨大的冲击，“多元智能模式”浮出水面。理论和技术的科学化、专业化发展，和对人本、科学、客观、公正的高度追求，使得第三方教育评价与考试更加普遍和成熟。

对教育测量评价的有效性、可靠性及可信性的内在追求，和对教育测量评价的人本化、科学化、客观公正的高度需求，以及教育分工专业化客观要求等的高度发展，导致教育实施、评价、咨询走向高度专业化分工，致使教育评价的第三方成为必然和普遍模式。

第三方教育评价与考试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

独立性。第三方评价与被评价方无隶属和利益关系，因而能不受干扰地进行评价，可以避免在发现问题、分析原因和作结论时避重就轻、主观评价；

客观公正性。第三方评价的独立性有助于保障评价过程的公正、公开；

专业性。第三方评价机构拥有专业的评价人才和技术，拥有专业的理论基础和工具，可大大提高评价的科学化水平，有利于增强评价结果的可信度和权威性；

进步性。由于社会化进程，需要在竞争中求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因此特别重视评价理论和技术不断提升与创新，以及评价产品和服务质量的不断完善与进步，具有天然的发展潜力。

中国教育评价与考试如何迈向人本、科学、公正、合理？引入第三方评价不失为改革之路。